

中华文明应对现代困局实现连续发展的理路：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理论的视角

刘田 张荣军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理论重要发源地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西方社会中由于异化劳动导致的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困局。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细致梳理进一步论述劳动价值－资本增殖－财富积累的内在本质和积极功能,进而阐明中华文明向现代国家转型实现连续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和开创新局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武器,充分发挥国家制度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和中国人民自信自强主体力量以有效应对现代世界体系呈现出的频繁动荡与发展困局。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资源的有机融通,稳步增进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丰富和发展,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出世界文明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中华文明;现代世界体系;主体力量;连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1]一百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以自信自强的进取精神持续激发广大人民的主体创造力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和生命更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在新的征程中肩负起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仍是我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2]中国共产党以坚定

文化自信增进历史自信铸牢中华文明作为现代国家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继续以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包容智慧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强化驾驭资本财富和科学技术的能力以有效化解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现实困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现代生产方式中异化劳动导致社会发展 困局的内在原因探源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来看,在农业社会中,对于作为自耕农和佃农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往往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花费几乎全部的个人时间和绝大部分精力。历史上频繁出现的灾荒、战争动乱等天灾人祸,使广大人民遭受了饥荒的威胁和生死的考验。人类文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两个结合’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高质量发展研究”(22VSZ029)

作者简介:刘田(1984—),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理论;张荣军(1975—),山东临沂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

期,生产资料同劳动者逐渐发生分离,农业上和工业上的劳动者在现代生产关系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更加不能把握自身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不是产生于偶尔的或意外的个别情况,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所产生的,他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独立于任何个人的意图之外。”^[3]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笔记本 I]中指出,“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成反比。”“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4]116}纵观世界各国近现代历史,普通劳动者在最为基本的生存层面上仍然很可能面对饥饿的威胁。^[5]劳动者“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4]119},广大劳苦大众为了自身生命延续而辛苦劳作。由于资本增殖逻辑形成的对普通劳动者生命延续的巨大压力,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历史阶段中广大劳苦大众作为生命主体普遍受到资本的压迫和奴役,难以获得物质富足和精神富足的良性发展。

随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在现代世界国家民族之间的蔓延渗透,如果没有一种新型文明发展理念的正确引领,那么“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中。”^{[4]120}资本增殖-财富积累本身可以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民族的社会秩序稳定和现代化发展提供基本保障,但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显现出各种血腥残酷的图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在各国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各国的劳动阶层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深重的苦难。^[6]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中劳动价值-资本增殖-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劳动实际上能够“与最崇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发生直接的联系”。^[7]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对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作用的不彻底性即片面性的现实困局。历史和现实中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遭受了被奴役被损害的具体境遇亟需加以有效的革新。

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一再表明,资本

主义的运行过于依赖社会经济的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本身具有滞后性和盲目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法律体系的规制,经济运行中容易频繁爆发各种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充满着血泪和苦难,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贪婪习性仍在持续地增强和肆虐。马克思指出,“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155-156}。在马克思看来,广大民众的辛勤劳动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奇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创造者(劳动者)被他的造物(剩余劳动-资本增殖)所压迫、所奴役。人的生产活动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虽然具有一定自为自觉的主体性,甚至人作为劳动者生产了他自身生存的整个自然界,他甚至“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163},但人的劳动形成的资本增殖-财富积累形成了具有恢弘魔力的私有财产,进而以私有制为基础构建出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呈现出一种虚假的迷离状态。“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4]166}人作为生命主体的劳动成果成了对他来说是外在的对立物。虽然这个对立物及其运动规律实际上能够被作为社会发展的生命主体认识和感知,但生命主体自身又很可能受到外化的资本财富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的支配。^[8]

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II]中指出,“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4]170},人类社会发展的应然方向是使人的劳动价值形成的资本增殖-财富积累推进人的本质的恢复和统一,实现劳动者与自身劳动成果的完全占有与和谐交融。资本的历史作用是为人类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创造一条架构在被压迫被奴役的现实社会与扬弃私有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座桥梁,为实现生命主体的全面发展和实质自由发挥坚实的物质基础功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指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以过度压榨剩余劳动实现资本增殖-财富积累构建的私有财产制度对现代社

会生产体系中人的身体、意识和思想的严重扭曲。

现代社会中过度追逐资本增殖—财富积累的历史和现实呈现了生命主体本质的外化造成的异化。^[9]在生命主体作为劳动者进行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占有生产资料的特殊阶层对于劳动人民及劳动价值的严重奴役和过度压榨,造成现代社会体系中产生四个方面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积累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不仅阐明了劳动本身的异化,而且存在着社会关系的普遍异化。^[10]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思想文化、法律体系和国家制度的正确引导和有效管控,有产阶级将继续保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动机: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得剩余价值和实现资本增殖,以实现盈利的最大化。这严重违背了劳动对于生命主体自身在本体论层面价值意义的基本认知和一般原则,导致了整个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普遍异化即被资本反噬吞没的现象;在现实层面表现为普通劳动者的身心遭受长期的奴役和压榨,导致不少生命主体进入到恶行循环的迷失境遇之中。

要化解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这种异化反噬,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之中。我们知道,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是人的生产活动,人自身的生产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Ⅲ]中指出,“财富——也就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4]183}。“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4]204}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是一种带有神秘化较为模糊的对“绝对精神”的理性思辨。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体系得到启发并进一步分析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4]210}。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是存在于人们想象的虚幻意识之中,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4]212}。异在本身指的是与人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化了的自然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洞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物与物关系的现象层面,而深入到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11]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现代性的超越性理论构建,马克思总结为扬弃异化劳动之后创造出共产主义社会新的运行机制。马克思主义开创者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不是否定人类具体历史现实的演进路径,不是否定人本身的革新力量和创造力量,不是主张倒退到朝不保夕的贫苦状态之中去。粗陋的共产主义试图构建一个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的乌托邦^[12]或太阳城^[13]等之类的空想社会主义及欧文新和谐移民试验、某些国家用暴力和压迫手段实行的集体经济,以历史实践的结果证明这只是一种徒具理想而不具可行性的探索。我们需要避免用简单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现代社会发展中私有制导致的严峻劳动异化—贫富分化的具体问题。

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这一批判理论指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因过度追逐资本增殖必然导致社会发展困局的一般进程。由于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必然使得劳动者的处境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改善。从马克思早期经济学—哲学批判基础理论的内在理路来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必然要转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新的文明形态必须要有其具体思想文化的历史积淀作为坚实基础,而中华文明思想文化的深厚智慧可以为我们探讨突破现代文明的发展困局提供一种现实的指引。中华文明本身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她在轴心时代已经创造出高度思辨的思想文化。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有效保障广大人民基本生活品质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较为长远性和包容性的思维,她更为注重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功利。

二、中西文明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不同路径 选择与思想文化差异

中华文明能够连续发展而没有断裂,自有其内在的思想文化根基。中华文明从汉朝以来,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廉、恭宽信敏惠等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逐渐成为主流思想,重视人伦而节制物质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商品经济的过度活跃,甚至不得不矫

枉过正地采取严格的边禁海禁、重农抑商等政策。中华文明到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统治者在有意地避免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正积极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革新思想体系,发挥工具理性不遗余力地推动现代生产方式和激发市场经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较为高效的国家行政体系运行机制,从人类文明的边缘一跃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体系有意地回避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机制,特别是到了清朝的中后期,与欧洲大陆大力运用科学技术构建现代生产机制和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形成鲜明对比。

纵观西方文明史,在私有制及其观念之下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力图探寻突破人类现实困境的有效理论和实践方法。康德以其细致的批判理论体系探究表明:整个人类伦理的发展,实践理性的统治,都按照与个人在经验上的满足相反的比例向前发展。^[14]资本主义在工业文明中的展开,不是超越了中世纪的私有制和神学思想的束缚,而是创造了对资本这个新神的膜拜,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巩固了私有制,形成了所谓的具有现代普遍性的“拜物教”^[15]。如果无法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私有财产制度和追逐感性经验满足上的迷失状态,人类本身很难突破社会发展中最为根本的劳动异化人的异化问题。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16]当然,满清政府极端的闭关锁国和保守自大的政策造成中华文明在近代以来进入到一种暂时落后的状态之中,在社会现实的层面表现为 1840 年以来遭受严重而频繁的社会动乱和民族危机。从 1840 年到 1949 年这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中华民族从人类文明的中心地位衰变成一个边缘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历史的内忧外患中部分民众一度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胆识和勇气、理性和自信,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表现

出手足无措和自我苦闷的精神状态。但在面对西方文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旗帜的殖民扩张、暴力侵袭之际,中华民族自有其英雄儿女在历史的紧急关头立于潮头浪尖,以奋发精神致力探寻中华文明长远发展的道路抉择。尽管中华文明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遭受了严峻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局,无数的仁人志士在苦苦探寻能够指导中华文明实现国家转型和社会稳健发展的理论武器。

这样的理论武器的锻造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 1844 年进行的经济学 - 哲学批判理论。在手稿的 [私有财产和需要] 部分,马克思透彻地指出了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转向。如果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货币,“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4]224},同样地,无度和无节制的现代生产消费体系必将激发出人们各式各样的“病态的欲望”。如果不对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体系进行必要的抑制平衡,现代社会很可能继续呈现出对资本增殖 - 财富积累过度的执迷,工具理性必将严重遮蔽人类文明进行中生命主体长期坚守的价值理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如果枉顾价值理性,“即使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粮食供给下降,饥荒也照样能够发生”^[17],即便最为基本的饥荒问题也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阿玛蒂亚·森分析指出,从人类社会的大饥荒事件中可以看到生命个体的交换权利存在着严重不平等性,现代社会体系造成了人阶层的分化和权利的分化。

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展出一个全新的视域,这一视域是以“对象性的活动”原理为核心的,而这一全新的视域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8]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183},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实现财富积累与人的本质的统一。从历史的现象层面来看,物质财富 - 货币 - 资本可以“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愚蠢变成明智。”^{[4]247}“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本质,并使他转化为主体。”^{[4]214}如果要想实现社会发展及人的自由和解放,首先需要解除人化自然界中私有财产制度对于人的压迫,使人本身成为整个物质世界中的主体。“共产主义作

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4]216}。海德格尔同样认为,“[无蔽、真理]要求一种对本己的本质现身的更原始的探究”^[19]。现代社会体系以劳动价值形成的资本增殖-财富积累-私有财产构建其恢弘魔力的过度生产体系和严重“异化消费”^[20]体系。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方法论出发,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及人化自然都是人的劳动在现实中的展开和呈现。在手稿中,马克思极为简明地论证了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本质的理论逻辑。“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才能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4]242}

人类文明需要向全面推进共产主义转向,真正的共产主义应当是对私有财产魔力体系的积极扬弃,实现私有财产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共产主义应当是人的自我本质在时空中具有主体性价值的显现,是人的本质在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个性的呈现,是人的本质在本体论意义上自由的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财富的积累和使用应当转变成为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持续稳定而存在,应当成为人类文明和平发展和国家民族全面进步而存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理论阐明了资产阶级对资本增殖-物质积累占有逻辑的荒谬性,而由这种占有剩余价值构建出的私有制与商品拜物教使人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工业的批判,警醒国家民族不要过度迷失在资本不断增殖的繁荣现象之中,还需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实现对私有制度的扬弃以促进生命主体整体价值的实现。

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劳动本质和价值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在人的本体论和存在论的现实层面上来进行探讨和阐发。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财产对人产生的压迫和奴役,不是人为地简单地消灭处于展开的现实世界末端的货币或资本,而是从国家民族连续发展的层面理解劳动本质及其功能价值。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初期,即马克思身

处的那一段表现得最为残酷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积累下来的活劳动形成的货币资本对人本身产生了极端的压迫和奴役。货币的本质是人的劳动,“货币所交换的……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4]247}共产主义可以实现对货币-资本现代社会体系的有效转变。通过人的创造性物质生产劳动,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在中生成的。^[21]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逐渐产生私有制的观念,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都被归结于对于物及物化对象的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限的追逐。要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必须对基于私有财产产生的现实制度的弊端及这些观念的积极扬弃。全面发展的人是生命呈现出丰富内涵的人,他的自我实现是通过自身的对象性活动,通过自身内在的必然性,即体证到生命价值与生命主体创造性劳动具有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的现实展开过程。

中华文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理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具有内在的呼应性。即现代中华文明不能继续走西方国家的那种压榨奴役劳苦大众和殖民侵略的旧路。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需要开拓出自己的新路,而这种新路是以自身厚德载物的思想文化为基础的,借鉴西方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而创造的中国道路。“马克思把人的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从而也就把人的劳动理解为整个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22]中国道路及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稳步引导作为劳动者的人民扬弃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狭隘意识,主动发挥劳动创造力量使得生命主体与整个对象世界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实环境和谐共生。现代中华文明及其思想文化主张“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将人民自觉自为的对象性活动和劳动价值整体性融入到人类文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进而稳步突破现代生产方式片面性所造成的发展困局。

三、党领导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实现自主自强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评理论可以有效指导现

代中华文明稳步突破现代世界体系中频繁动荡的发展困局。通过对手稿思想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领会到马克思从存在论层面上是如何把握“现实的历史”的。^[23]“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4]500}马克思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来考察和探索这个问题,并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发展主体发挥人民创造力量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现代中华文明注重开拓中国式的自主发展,因为中国要实现人口基数巨大的现代化,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和有机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一方面要稳步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注重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共生,“实施自我克制、计划生产与适度消费……实现生态重建的现代化。”^[24]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要从实践上回应和解决生命主体权利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广大劳动人民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破除阶层固化体制机制障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5]。

中华文明要实现连续发展,需要以深厚战略定力洞察世界大势,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愿望和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取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创造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遭遇了各种严峻考验,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国家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始终没有动摇。在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曲折之后党领导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在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后,中国人民凭借自身的劳动力量和奋斗精神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新时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进一步传承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有效增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通过对象性活动发挥主体创造力量推动社会发展。“事物就是我。……事物只有在关系中,只有通过我以及它与

我的关系,才有意义。”^[26]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广大人民发挥自立自强精神勇于承担国家民族发展的重任,在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合作的同时发挥自身原创力量实现中国核心科技自主创新,保障好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人为地、任意地消灭或否定资本,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资本有效地引导并融入国家政策法律总体框架之下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党领导人民以主动创造精神和系统思维应对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和国内错综复杂局势,积极扬弃现代世界生产消费体系中存在的各种消极效应,有效化解人民的生存压力和各种发展困境。在全球化经济迅猛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国内外资本仍将在现代中华文明的国土上进行生产活动,但资本必须在中国政策法律框架之内活动,绝不允许资本泛滥,绝不允许资本过度的贪婪本性浸润侵蚀党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时代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自我完善,在历史进步中实现自我进步。”^[27]从扬弃私有制的角度来讲,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对于物质财富本身的价值有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认识,一方面理性地认识到社会发展中财富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财富本身具有的侵蚀和破坏魔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一旦对于处于理论探索中黑格尔绝对精神而言的秘密不复存在,一种绝对主体性和内在性就回撤到实践基础上而确立起来。^[28]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29]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机构绝不是封建地主或资本家用来统治压迫人民的官僚机关,而是为人民服务,并用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工具。”^[30]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1]共产党

人的指导理论和实践目标就是要逐步消除阶级对立和对抗,扬弃一切人对人剥削和压迫的不合理制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同人民一道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异化理论包含的阶级分析使得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拜物教理论得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3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为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价值体系,引导人民不断紧密团结奋斗发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科学理论和保持政治稳定,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实现扬弃劳动财富—资本积累对人的压迫,实现中华文明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奋力前行。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简单地直接取消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和否定市场经济的供需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需凭借法律制度中的物权体系解决经济领域的效率问题。^[33]马克思在分析了斯密的思想后认为,“竞争就是抵制资本家的唯一手段;……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好影响,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4]134}现实存在的产权体系或私有财产可能对于人的基本生存产生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压力。随着我国对经济领域宏观调控能力的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生产领域的效率效益和推进分配领域的公平公正,人本身被外化的资本财富束缚和压迫的问题可以得到逐步缓解,能够有效避免人本身沦为现代社会生产消费体系中私有财产—资本积累的异化实存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25]从 1921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100 多年的艰苦奋斗,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而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历史时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总体上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基本生存问题,并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理念奠定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中流砥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消除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压迫和奴役现象,将资本引导和管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法律制度和价值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挥资本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增强“四个自信”,将资本和财富的魔力控制在党和国家的组织力量和发展战略之下,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以彰显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显著优势。

拓展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作为生命主体的本真状态的提升。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并领导人民于 1949 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二十一世纪新时代,领导人民通过自身艰苦奋斗和创造力量实现了中华文明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新时代中国更加积极地向世界开放,彰显出现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为那些还局限在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之中的民族主义国家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必将进一步彰显,国家民族的劳动创造力量和思想文化智慧必将有效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持续丰富和完善。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篇》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之下,坚持广大劳动者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以彰显出中国人民的主体创造力量。新时代中国以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的国家智慧,有效保障国家民族的政治稳定和稳步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美好生活以有效增进中华文明自主自强的稳健发展。

四、结语

现代中国道路之所以是光明的,就是因为她是基于中华文明深厚积淀的连续发展,同时积极开拓和构建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传承发展马克思原

创理论的思想精华,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力量。中华文明具有构建天下大同世界的思想底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异化、私有制的批判思想具有深度的相通性。当代国际关系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资本力量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入,党领导人民在严峻复杂的现代世界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开拓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向现代国家转型实现连续发展创造的中国道路,为现代国际社会克服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严峻危机给予了重要启示。中华文明作为至今唯一实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这本身说明了中华文化内蕴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强大功能。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虽有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有过遭受列强侵袭的历史时期,有过出现曲折探索的历史时期,但是现实证明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中华文明总体上具有革故鼎新的创造活力和凝聚统一的国家精神,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更是以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与保合太和的处世原则积极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厚智慧,持续引领世界各国构建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共建共享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和伟大实践必将开创出世界文明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孔明安, 刘婵婵. 从“异化劳动”到“拜物教”批判的内在逻辑——兼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新审视[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73(3): 21-28.
- [3] [美]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73.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印度] 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序言 2.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67-350.
- [7] [德]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75.
- [8]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译序 7.
- [9] 陈敬国. 作为社会与历史总体的异化——马克思总体异化思想探微[J]. 天府新论, 2021, (6): 26-38.
- [10] 张端. 超越异化劳动的劳动解放——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考察[J]. 云南社会科学, 2016, (4): 44-48.
- [11] 王一焜, 胡海波. 从“物的关系”到“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社会观革命[J]. 现代哲学, 2016, (5): 30-35.
- [12] [英] 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序言 9-11.
- [13] [意] 康帕内拉. 太阳城[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再版说明 1.
- [14] [德]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767.
- [15] 吴照玉. 从劳动异化论到商品拜物教——再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理论嬗变[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 (6): 65-73.
- [16]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中文版序言 1.
- [17] [印度] 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98.
- [18] 谭培文. 马克思劳动意义的文明视野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考察[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4): 80-87+156.
- [19] [德] 马丁·海德格尔. 哲学论稿[M]. 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6:393.

[20]董琦琦.“异化”流变:从异化劳动到异化自然再到异化消费[J].学习与探索,2020,(3):141-147.

[21]朱松苗.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J].学术交流,2016,(11):22-27.

[22]侯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纪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170周年[J].哲学动态,2014,(8):5-15.

[23]吴晓明.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思辨辩证法的批判[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0(1):1-10.

[24]胡云皓.晚期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与生态——论安德列·高兹对异化消费的生态批判[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6):1-9.

[25]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求是,2023,(19):4-8.

[2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95.

[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8]张文喜.“实践”为“时代”奠基——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9(6):98-107.

[29]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1095.

[30]邓小平文集(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5.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32]王世强.再探异化理论与拜物教理论的关系——基于对《巴黎手稿》和《资本论》的文本考察[J].天府新论,2023,(5):11-20.

[33][美]曼昆.微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4.

[3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72.

(责任编辑 张亨明)